

# 說飲食男女

果庵

早晨起來就聽見外面鑼鼓亂敲，又有笙笛和軍樂的聲音，嘈雜不堪，這是使人很難分清婚儀或喪儀的一種行列，在中國凡是有錢的人大約都是喜歡擺出這種「局面」的。例如在北京喪儀中有和尚、道士、喇嘛、清音、（即普通中國樂器）軍樂等各式各樣的樂隊的吹奏，在前面引路的則是號角，碩大無朋，無疑地是從蒙古或回部傳入的。婚儀中雖然免去僧道等，軍樂和清音還是有的，從遠處聽起來只是雜亂，所以我說很難分清其為哀、為樂。這種不愉快的混亂，似乎屬於無意義之浪費。但轉而一想到作為這種生活及禮儀本質的中國思想及文化，便又不免別有領悟了。

如周知堂先生在「中國的思想問題」一文中所云：中國人的思想只是平實。他們的最高亦即最局限度的要求便是飲食男女，能够解決了這些問題，政治便有軌道，可以作到「無為而治」的地步。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喪儀，也是死人作為活人一般的待遇着，給他祭奠，便是活人的飲食；焚燒冥錢，預計在靈魂的世界也是金錢萬能的，并且在地獄裏也充滿吃不飽的餓鬼，這是最可怕。各式書樂，表示不分畛域只要給死者與活人安慰便佳，中國人不善於於冥想，像佛經和基督教的樂園天堂那麼燦爛光華，却非需要，只要受受當當的渡過陰陽關頭，重新再託生於理想家庭之內，這便很滿足了，這種對於生之執着，在其他民族真是少有；佛教是講解說，基督教要升天國，太抵都是把現實的人間視為羈絆，唯有中國人不然，人死

之後對於後嗣問題看得十分重要，死去的人不離「血食」，那是對於死者最大的缺憾，這乃是飲食男女慾望之無限的延長，這要求看似過於原始，其實却是非常切實而基本的，沒有這要求，則新的理想都是落空了。

因之，古代的王道也只是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食肉衣帛的那麼簡單的事。可是雖然簡單，在古今中外歷史上能够活得這樣安適的時代與國家也就不多。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在中國發生很長時期的作用，至今仍舊不衰者，無非因為其指示的標的頗與國民的動機與需要相切合之故，我們看：在黃河流域一帶土著人民的簡單生活，就該明白絕對不需農天呀，極樂世界呀，一類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古人所傳說的康衢擊壤之歌，正是非常真切的民衆的表情，原來中國人民對於帝王的改變的確無所關心，還是對於能維持他們簡朴的生活與否特別注意，倘使新興的統治者不能注意到其基本要求，亦即飲食男女諸事的時候，無疑的是不能維持長久的，對於生活執着的人，不能用宗教的預言去騙欺他，故假借宗教的誘惑力量以期達到政治目的的人，總歸要失敗。黃巾、白蓮教、以至太平天國的假冒天主教都是好例子，查中國人絕無興起十字軍向異教徒攻伐的熱忱，亦無為求法而跋涉山川之需要，文英和法顯雖是僅有的人物，大致也是爲了學問之興趣的罷！

因爲沒有宗教的需要，故孔子在中域只是先知先覺的聖賢，而不是說

得神異百出的教主，有的人頗以中國無宗教為缺憾，我則以為這正是一種值得誇耀的民族進步，當五胡十六國時期因為沒有文化的外族侵入中土，附帶來了佛教之昌盛，但不久傳入江南遂成為純粹的哲學，而且漸漸變為純中國哲學了。宋人把佛教的法則取去了去，裝在孟子和大學中庸的幾句話上，於是利用佛學的工具來打倒佛教了。道教算是中國人自己創的教了，其道理有的是出於傳統，那實在還是「鷄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主張者老子的餘餘，老子只是看了戰爭可怕，也可以直接威脅了人民飲食男女的生之要求，所以才出來講了這樣的話，而道教者之起來，則也是利用了亂世人心之不安，如張魯之徒是也。然他們之能够存在了這樣多的年代，主要還要十分投合着人民的期望與要求。雖則一面模擬着佛經的三藏，也變成道藏，而在代替着佛祖諸天的玉帝等神那一面，則儼然組成與人間世的朝廷一般，行使着與帝王相似的特權。他們可以煉丹鍊汞，無非為了變出更多的飲食男女，財富與壽命的增加。墮落誠然墮落，但其本於求生之意志，則乃絕頂聰明。又如福祿壽三星的崇拜，世俗而平易，不是像菩薩戒的聲聞辟支果那麼奧遠艱難，就是專在男女的一方面，也有專為求嗣續而祈禱的神，叫做「子孫娘娘」的存在，而且連佛寺也通融着關此一席，為善男信女多一祈禱之區，即是和尚可以多增一番收入也。焦理堂易餘齋錄卷十八云：

「俗云：人求福於佛於神，故畏之，而不畏孔子，以孔聖人不管人間求福事也。按封氏聞見記云：「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殊為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僕魏孝文治子廟不聽婦人合雜，祈非望之福，然則流俗所為，有自來矣」。是則魏孝文治後，至唐時仍有祈子求福者，則當時

世俗之求福於孔聖人，何嘗不若求佛求神也？」

這雖然是笑話，其實正可以代表所謂「流俗」亦即民衆的要求，不能不說是很健康而淳朴的。本來孔子也並不是反對生之意志的，例如禮運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話也是孔子的話。而其理想的政治，便是「足食」「足兵」，足食不必說了，足兵也只是所以保護生活的安全耳，維持最低的生存條件耳，絕對不含侵略的因子在內的；論語云：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然則夫子之栖栖皇皇流浪到許多國家去，可以斷定不是要求什麼富貴的；其理想的生涯，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即是中國讀書人所常常欣慕的隱士生活，淵明先生所云：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隴，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即是上述境界的擴大，中國儒家之所謂返自然，出樊籠，並非真有什麼海闊天空的世界，值得羨慕，如古代希臘神話中所描寫的神之世界，或佛教樂土等云云，本本分分不受擾亂的過着農民的太平日子，好像就很快樂了，但孔子乃是大乘的，入世的，推己及人的，所以不怕碰了釘子，到各國去推行自己之理想，儒家所提倡的理想，旨在於此，如果沒有恕，仁字也就不能實現了，淵明先生，好像是道家的，事實上卻是受了政治上的刺激，覺得自己的力量不能兼善天下，於是只好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去過個人隱逸生活，我們應當認為這是儒家的悲劇，不可認為其得意與高尚。不信，請看下面的詩：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勸，日入負米還，山中餽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能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因爲儒者乃至一切中國人之本分，正如孟子所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而不是願自己升入天國，看着多數愚人受裁判的。所以像陶公這樣，胃露露而躬耕，却正表示如是沮溺所慨嘆的天下無道耳。

因此孟子才說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顏回簞食瓢飲雖是自得其樂，但其用心乃是與拯溺救飢之禹稷相同，沒有機會或是時代不允許就成隱士了。世俗多以爲隱士是出世的，而不知正是入世的，入世不得，乃不得不回到家中看看行雲流水耳，中國的詩歌，圖畫，文章，處處表現恬淡生活的境界，自耕自織的十足原始生活的快樂，須知這便是四萬萬人一致的要求與好尚，無論什麼樣的力量與宣傳都不能改變的，假使人類連這樣一點簡單的要求都不允可，那就成了暴虐與無理。假使超過這種思想而另外有過於物質的希冀，也是「不奪不饜」的召亂之原，有許多人在說東方文明是精神的，在我看來，這精神文明却是建設在平實合理的物質基礎上，因爲物質要求不是奢侈與跋扈，所以才成了特別有慈和與大光華的精神文明。

可惜這個意思在中國也被許多學究式的學者弄錯了，由於簡單的飲食男女之需求而變成禁慾的清教徒式生活，其反動乃變本加厲的成爲奢侈與無人性，易餘齋錄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學究矯情，

實違其本心。於是耳食者以爲虛賢，遂居之不疑，忍其欲，制其情，氣血日戾，疾湧胸塞以死，不異置農夫於柔毛棉幕，梁肉醃桶也。」

明清以後類此的議論很多，勉勵制欲之害不止於如置農夫於梁肉醃桶，倒像把飛在空中的鳥閉在籠中，不但不合理，而且也不道德。細細想來這，種不健康的說法與辦法，好像從宋朝以後才大大流行，在東漢時曾有過一個時期盛行着矯情的風氣的，到六朝就得到解放，竹林七賢都是禮教的反對者，放誕的實行家，物極必反，宋朝人遂利用了佛教的哲學與規律來束縛儒家的「適欲」思想了。但與提倡婦人守節之說同時，即在士大夫中特別流行着狎妓與納妾之事，禁欲云云，完全成爲虛偽的矯情，何怪後世不少人要對之加以嘲諷與駁論呢？不過這還是消極的一面，若是像知堂先生所說：

「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迫切，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道德不願損人利己，却也不能如聖人的損己以利人，別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爲求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爲神爲道犧牲，但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到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挺而走險，急將安擇也。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飢不寒爲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孔子之言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的現象就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這里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竟說明了，就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並不由於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人民欲望之被阻礙，或不能滿足而然。」

此實不刊之論，太平與動亂，其分界原極簡單而微細，古諺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於一個人之受飢受寒不得其所原亦不可忽視也。此乃飲

食男女關係之積極的一面，雖是與書呆子如我輩者似乎不相干，而實是關係甚大的社會問題矣。

冊三年八月十三日

## 中國資源講話

李長傅

### 其一 農產資源

前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雷瑪(G. F. Renner)教授曾說西方人是礦物文明，東方人是植物文明 (Vegetable Civilization)。我們也常自稱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在歷史上看來，歷代的重農政策，固然表示中國是個農本主義的國家。而現在的全國人口中農民至少佔十分之八以上，除邊疆外，人民大概以農業為主要產業。所以無論如何，農產資源，是占中國資源的第一位的。

前幾年翁文灝博士，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他反對我們自稱中國地大物博，而主張中國地大而物不博。翁氏分析中國的地形，估計平原地面積三十八萬方英里，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十，盆地面積六十萬方英里，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十六，丘陵地面積三十四萬方英里，占全國面積百分之九，山地面積一百二十萬方英里，占全國面積百分之三十，高原面積一百四十萬方英里，占全國面積百分之三十五。而說中國可耕地不過平原地和盆地丘陵地的一部分面積約在一百萬至一百三十萬方英里之間，即約四十萬萬至五十萬畝。其中已耕地不過四十萬方英里，即可耕地面積三分之一，只

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十二，而斷定中國地雖大而物不博。

估計中國已耕地面積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十二，這還算高的，也有估計為百分之七的。(我國沒有正確的統計，所以這兩個數目，我們沒方法加以斷定)若和德國的百分之四十，以至與日本百分之二十六比例，僅僅這一點講，中國農業已經不能算發達。更就中國農產品的生產量而言，雖然也沒有正確的統計數字，但農產品，並不豐富，確是事實。我們一般想像，以中國為農業國，輸出農產品而輸入工產品，並不是實在的情形。即就我國最重要的食糧米麵粉而言，每年就須要大量的輸入，所以中國農業之不發達，那是無可諱言的。

可是就耕地的狹小，農產品的不足自給，而就決定中國地大而物不博，未免陷於機械的論斷。中國耕地狹小，農產品缺少，不外由於自然和社會的原因。自然的原因為氣候，地形，土壤的限制，水災和旱災。社會的原因，如帝國主義之壓迫，農村封建勢力之支配等，而使中國農耕地不能發展，農村窮困，農產品減少。這都是可以改進的。試舉一例，洪水旱災為我國農業的大禍害，而水旱之原因固然受雨量的支配，但是森林的濫伐，灌溉水利的破壞，也是重大的因素。如社會條件改善，即水旱災可以被